

海外人士心中的 邓小平

主编 金 羽 李惠让 温乐群



海外人士心中的 邓小平

金 羽 李惠让 温乐群 主编

红旗出版社

(京)新登字 108 号

选题策划 李惠让

李 凡

黄苇町

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

主 编 金 羽 李惠让 温乐群

责任编辑 毛传兵

封面设计 张 雷

出 版 红旗出版社(北京沙滩北街2号)

发 行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中西印刷厂

850×1168 32开 17.5印张 420千字

1993年2月北京第1版 1993年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 1—20000册

ISBN7—80068—450—4/D·185

定 价 12.00元

序 言

邓小平同志不仅是当代中国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是当代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是当代世界杰出的政治家、战略家和社会活动家。邓小平同志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无产阶级战略家的胆识,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许多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从而逐步形成了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在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改革开放的14年来,中华大地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到处是一派生机勃勃的兴旺景象。这不仅是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想象和从未有过的,而且也是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如果说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大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是中国有史以来的一场最伟大的革命,从而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那么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

和全国各族人民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一步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再经过长期奋斗,把中国由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变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则是在中国发生的又一次伟大革命。邓小平同志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亲自筹划、部署和领导了这场新的革命,已经和正在深刻地改变中国社会的面貌,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为世界各国人民所瞩目。继毛泽东同志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之后,邓小平同志代表着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十四大报告中所指出的:邓小平同志“尊重实践,尊重群众,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善于概括群众的经验和创造,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邓小平同志及他的思想理论正在影响着中国,也影响着世界,引起了海外人士的广泛关注。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的思想理论曾经在当代国际社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今后仍将发挥其重要作用。因此,全面地、系统地研究邓小平同志的生平和思想,把握其思想精髓,对于当代国际社会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特别是在今天,国际风云变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在发展过程中遇到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更需要我们掌

握邓小平的思想理论,以明辨是非,把握正确方向。

《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一书是在红旗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宝库》一书的基础上,选其第十五编的资料而独立成卷的。这里谨致说明。本书力求比较全面、系统地汇集和精选国外及港、澳、台学者研究邓小平生平、传记、思想理论等大量资料。这些资料,虽然受到某些条件限制而不够翔实、齐全,尚有挂一漏万之处,但为我国学者所鲜见,使人耳目一新。我们编辑本书的愿望是力求向国内学者和读者提供一个新的视野,拓展学习和研究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新天地。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已经注意到国外及港、澳、台学者的复杂性,尽管他们的一些看法比较客观,但所研究的目的、动机不同,以及所持的立场、观点、方法各异,为此我们做了一定的提引和评论。这是需要说明的。

由于我们编辑时间仓促,水平有限,加上所搜集资料的困难,书中的疏漏和错误在所难免,欢迎批评指正。

主 编
1992年10月

85620

目 录

序 言	(1)
-----------	-------

研 究 综 述

一、研究的历程	(1)
二、主要观点介绍	(4)
三、如何看待、利用海外关于邓小平研究的成果	(30)

研究成果精华汇编

一、关于邓小平的政治生涯	(34)
二、关于邓小平的现实主义——中国现代化的 理论基石	(162)
三、关于邓小平的中国强盛之路——改革开放 的理论政策	(214)
四、关于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理论	(406)
五、关于邓小平的“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 思想	(436)
六、邓小平南巡谈话，新的改革开放大潮涌起	(499)

研究综述

国外和港澳台对邓小平的研究是随着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发展而迅速兴起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作为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影响和推动着中国的内政外交。在他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大胆地进行了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工作,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实行改革开放,大力进行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邓小平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以“一国两制”的构想实现祖国统一,主张实行旨在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安定的国际环境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积极倡导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等。所有这些,都使他成为一位名扬海外,具有世界影响的著名政治人物。正因为如此,近十年来,国外和港澳台学者对邓小平的生平和思想进行了大力研究。这里,仅就我们所掌握的材料,简要地介绍一下这方面的研究概况。

一、研究的历程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国外关于邓小平的研究不多,而且大多散见于有关中共党史和中国政治研究著作当中。关于对邓小平的研究真正的开始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恢复和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摆脱了长期以来“左”的干扰和束缚,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建设车轮的重新启动,邓小平开始为世人所注目,对于邓小平的研究随之而起。

国外关于邓小平的研究首先是从生平研究和传记的编写开始的。1980年,香港波文书局出版了《邓小平复职始末》(司马长风著),详细叙述了邓小平1977年复出的来龙去脉。同年,香港中道出版社出版了《刘少奇与刘少奇路线》(许冠三著)。在这部主要研究刘少奇生平与思想的著作中,有许多地方涉及到了邓小平。近几年来,港澳台陆续出版的关于邓小平生平活动的书籍还有《中共第一强人——邓小平》(原名《邓小平外传》,舒扬著)、《邓小平评传》(第一、二卷,香港东西文化事业出版公司1988年版,寒山碧著)。此外,日本、德国、英国都曾出版过邓小平的传记,如《不屈的革命家邓小平传》(日本和田武司等著,德间书店1978年出版)、《邓小平传》(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著,安斯他尔特出版公司1987年出版)以及英国记者那维亚、匈牙利记者巴拉奇·代内什分别撰著的《邓小平》等。这些传记的出现,既反映了传主影响的扩大,也反映了关于邓小平的研究逐渐繁荣。

但是,作为一个十分活跃并有着巨大影响的政治人物,对邓小平既往的生平活动的研究只是整个邓小平研究的一个部分。国外学者在注意研究邓小平生平的同时,更把注意力放在他那新鲜、敏锐、开放思想和恢宏的理论构架上。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理论政策在中国产生的影响日益巨大,许多人开始细致认真地研究邓小平的思想理论,研究邓小平领导下的当代中国的发展变化。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转折期的中国》(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版,香港大学学生国事学会编)、《巨变中的中国论文集:为现代化而进行的一连串改革》(香港专上学生联会、集贤社等1984年联合出版)、《论中国——神州巨变》(后改名为《中国社会主义论》,鲁凡之著,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版)、《江山辽阔玄多时:论中国现代化》(香港浸会学院学生会国事学会编,香港青文书屋1989年版)、《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陆铿著,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8年版)、《转变中的大陆》(叶洪生等著,台湾联合月报杂志

社 1986 年版)、《前瞻与期待》(张京育等著,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 1988 年版)、《中国人的三个政治》(金耀基著,台湾经济与生活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8 年版)、《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美国威斯康辛—奥斯科谢大学政治系教授戴维·W·张著,1989 年出版)以及澳门记者杨鹏翔著的《伟大的改革家邓小平》,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泰韦斯所著《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等等。在这为数众多的著作中,学者们研究了中国在邓小平主持下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和长期形成的僵化、保守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生活开始全面走向现代化的历程,对改革、开放的成就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评价,并试图对中国的前途作出预测。

自从 1984 年邓小平依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现实状况,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和统一祖国的构想以来,港、澳、台舆论极为关注,因为这与自己的命运、前途息息相关,各方面的学者就“一国两制”的形成、依据、可行性和意义,展开了热烈而广泛的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提出了许多意见和建议。这些讨论后来或结集出版,或广征博引写成专著,如《一国两制与台湾》(李达编著,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 1987 年版)、《中国统一问题论战》(陆铿主编,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 1988 年出版)、《台湾与“三通”》(李达编著,香港广角镜出版有限公司 1988 年版)、《中共对台政策与台湾前途》(叶芸芸主编,台湾人间出版社 1988 年版)等等,还有一些文章散见于大量的报刊和各种著作之中。目前,这方面的文章仍不时出现,可以说,“一国两制”的研究是港、澳、台邓小平研究的一个热点。

上面所介绍的都是一些专著或论文集,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关于邓小平研究的文章散见于各类报纸、杂志上,这在后面我们会提到。

1992 年初,邓小平到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视察,并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谈话,这再次引起国外对邓小平的关注,许多报刊发表了

大量的评论文章,由此引起了一个不小的热潮。相信,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步伐的加快,邓小平的研究会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关注。

邓小平研究的兴起和发展,反映了邓小平在当代中国和世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许多学者是出于对中国发展的关心而开始研究邓小平的。对邓小平的研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研究。这些学者对于邓小平领导的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普遍抱着支持和欢迎的态度,他们希望通过研究和舆论导向,为中国现代化尽一份心力。当然,由于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差异,他们的一些主张未必适当,甚至是错误的。比如,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必须搞议会制和多党制,这显然是对邓小平思想理论的极大误解,也是不能为当代中国发展所接受的。另外,由于站在不同的政治立场上,有些研究则带有明显的政治倾向。1984年邓小平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统一祖国构想,这标志着中共已从建国初期的“解放台湾”发展到符合时代要求和海峡两岸人民利益的和平统一战略。为此,台湾一些学者开始大力研究“一国两制”思想,写了许多文章,提出了与“一国两制”相对抗的“一国两府”的理论等。其中有些文章实际上是仍然坚持“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些差异和不和谐之处,读者在阅读时会自会明鉴,毋庸赘言。

二、主要观点介绍

国外和台、港、澳学者对邓小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生平研究,改革开放的理论政策研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一国两制”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是围绕着中国现代化建设这个中心而展开的。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众多的研究者和研究成果中,除上面介绍的以外,比较重要和有影响的还有美

国著名的学者费正清所著的《伟大的中国革命(1800—1985年)》和《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美国威斯康辛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莫里斯·迈斯纳著的《毛泽东的中国及后毛泽东的中国》、戴维·W·张著的《周恩来与邓小平在中国领导继承的危机中》(中译本书名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这些著作中也直接或间接地涉及到邓小平的生平活动和思想理论的研究,也可以看做是邓小平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

下面将海外对邓小平研究的主要方面和观点分别介绍如下:

1. 关于邓小平生平的研究

海外学者由于缺乏资料,加之对中共党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比较隔膜,对邓小平的生平只能予以粗略的描述,有时甚至主观杜撰,因而经常出现一些不准确甚至错误之处。有的作者缺乏严肃认真的科学态度,甚至有些哗众取宠,故所撰著的邓小平的生平传记更是错误百出,不堪卒读。如台湾、香港出版的舒扬所著的《中共第一强人——邓小平》、《邓小平的私生活》就是典型例子。

在目前海外出版的关于邓小平的生平研究著作中,有一些参考价值的要算是香港寒山碧撰写的《邓小平评传》(第一、第二卷)和德国记者乌利·弗兰茨著的《邓小平传》。

《邓小平评传》第一卷和第二卷是由香港当代历史研究所和东西文化事业公司分别于1984年、1986年出版的。作者态度比较严肃认真,在搜集材料方面也下了一番功夫,特别是翻阅了一些报刊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红卫兵小报,因此有些内容是比较准确的,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由于作者对中共党史缺乏深入的研究和了解,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直接材料的缺乏,因此对邓小平的生平实践活动缺乏全面的系统的描述,常常将一些重要的活动事件一笔带过,有时则将邓小平的活动淹没在大量的历史叙述之中。从严格意义上讲,它不能算是一本真正的邓小平的传记。

《邓小平传》的作者乌利·弗兰茨在1977年到1980年间曾任驻北京的记者，亲身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和邓小平的第三次崛起，由此引发了他写作邓小平传记的想法。于是开始着手资料的搜集和积累，并深入到各地进行采访和调查，还得到了香港、台湾、法国一些学者的支持和帮助，于1987年完成和出版了《邓小平传》（德文版）。应该说，这是一本关于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的著作，作者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是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期间的活动描述，作者在法国查阅了一些档案材料，基本上勾勒出了邓小平在法国的生活工作情况。但是，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书中对邓小平的生平实践活动的介绍也是不够系统和全面的，而且对有些历史事件的认识和理解也是不够准确甚至是错误的。

总之，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尚没有一本真正的邓小平传记的出版。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国内学者的努力。

此外，港、澳、台一些学者还集中研究了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三起三落”坎坷经历和1977年以后的实践活动，如关山著《邓小平江西蒙难记》和司马长风著的《邓小平复职前后》。前者介绍了邓小平“三起三落”的经历，特别是1969年到1971年在江西新建拖拉机厂被监督劳动的一些情况，但此书史实叙述不准确，理论分析也很不够。后者分析了邓小平1977年第三次复出的来龙去脉，但书中把中共党内路线斗争看做是一场权力斗争，认为邓小平复出是中共党内权力平衡和再分配的结果，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与邓小平生平实践活动研究相关的是对邓小平1977年复出后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研究，也就是海外一些学者提出的“邓小平时代”或“后毛泽东时代”的研究。他们认为这是在更广阔更深入的层次上对邓小平的研究。所谓“邓小平时代”或“后毛泽东时代”，是从“非毛化”（包括重新评价毛泽东）开始，逐渐过渡到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最后完

成。曾凡之认为，“所谓‘后毛泽东时代’作为一个与‘毛泽东时代’，相对照的历史范畴，首先便带着将中国从该特定领袖人物在集权运作下对历史和现实的特殊影响解脱出来的性质”，“当1976年中国于广义的范畴上进入‘后毛泽东时代’的时候，这个时代的开端，实处于‘毛泽东时代’的窒息阴影笼罩之下；而本质上，中国若要真正终结‘毛泽东时代’，却必须通过由某种程度可称之为‘非毛化’的进程作配合”。作者认为，“非毛化”只是“后毛泽东时代”对“毛泽东时代”的负数计算，破坏之后必须重建，而为“后毛泽东时代”定性（即所谓“正数”计算）的是邓小平的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理论的提出。金耀基认为：“真正为邓小平时代定性的，则是‘十三大’所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

1992年初，邓小平以88岁的高龄再次视察深圳、珠海特区，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的步伐，强调要警惕右，特别要防止“左”的倾向。邓小平南巡重要谈话在国外以及在台湾、香港、澳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报纸杂志都及时报道了邓小平南巡的经过和有关谈话，以及南巡谈话所引起的反应。总的说来，他们对邓小平南巡谈话表示欢迎和振奋，极力赞同并支持邓小平提出的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加快改革开放的谈话。有的文章还联系邓的经历分析了邓南巡谈话的背景和原因。香港《紫荆》杂志1992年4月号发表的《邓小平为何重申反“左”？》的文章中，指出“邓小平三次遭诬陷、打击，均来自‘左’的方面”。1933年，他由于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反对王明“左”的错误路线，结果被作为“罗明路线”的成员被打倒。文革初期和1976年，他又两次被极左路线打翻在地。因此，邓小平“一生饱尝了被迫离开事业和岗位、忍辱负重的痛苦和辛酸。几次‘左’倾错误猖獗，不只是邓小平个人受伤害，而且给中共、国家和民众带来了灾难”。作者认为，邓小平的坎坷遭遇是他终生反“左”的重要因素之一。此外，他依据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得出搞“左”搞右都可能葬送社会主义的结论。文章认为，中国长期

受“左”的危害，流毒尚未肃清，最近并且有死灰复燃的趋势。“‘六四’以后，内地‘左’的言论时有出现，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则更加明显。比如，有的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有的主张中共应把反和平演变作为头等大事，否则即使经济发展了，也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有的判断事物不是看它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国计民生，而仅仅看它是否符合传统理论。甚至有的想从‘文化大革命’的理论里挖出什么‘正确’的东西。近年来，内地某些地区出现的所谓‘红太阳热’亦不可小视。是否有人想借助毛泽东来否定邓小平，为‘左’的东西招魂，亦未可知。”这篇文章结合邓小平生平经历和国际国内形势，深入分析了邓小平重申反“左”的背景、原因，有一定的深度。

随着邓小平两次被美国《时代》周刊选为世界新闻人物，被赞誉“对世界大事的进程产生了最深远影响的人”，海外学者开始重视分析研究邓小平的思想品质、领导风格和艺术，以及性格特点，并把他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袖进行比较研究，分析邓小平能够崛起并成为一个世界著名政治人物的原因。这方面的成果是邓小平生平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比较深刻、富有启发和颇有价值的。

他们普遍认为，邓小平是“一位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讲求实效的人”，“是一位有务实个性的领导人”。他那句很著名的话“不论黑猫白猫，逮住老鼠就是好猫”，最典型地反映出他的务实风格，就是他厌烦不必要的理论解释的证明。他只要看结果，而不管这些结果是如何得来的。“他认为人们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制定方针政策，找出前进的方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只有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才是有价值的。”

他们还认为邓小平是一位能经受各种挑战的领导人。“同其他伟大的领导人一样与那些专家相比，邓小平显示出高瞻远瞩的非

凡才能，他看清了他所能预见而专家们难以想象的未来。”他领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是他前面任何一个领导人都没有过的。

著名华裔学者、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奥斯科谢分校政治系教授戴维·W·张在他所著的《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一书中，分析了邓小平独特的领导艺术特征。他认为：首先，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胜利的对抗主义者。”但是，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这一点是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大进步。另一方面，为了做到‘又有集中又有民主’，邓认真考虑并采纳来自人民的意见。邓把纪律和自由相结合，是为了建立一个联合战线。如果把他看作一个带有传统务实主义色彩的现代革命家，邓的社会主义民主将更容易被看成是共产主义理想境界的真正代表。”

其次，“是偏爱组织处理，邓小平自己就是一个按制度办事的官员。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党务工作者，他经常在八路军中的各部门代理党的领导工作。后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也是如此。在这样的职位上，他必须作出不仅能代表上级党组织而且能得到同级军事指挥员支持的决定。中层机关里的这种横向和纵向的工作经验，使他养成了决策制度化习惯，同时他也了解和熟悉军事指挥员。”

第三，是邓小平“从不在党内、政府内和军队内部搞自己的小宗派。这一点为党的领导集团所公认。邓象周恩来一样，很尊重各级政府官员。他到处都有忠实的朋友和下级，但不是小集团联盟。毛泽东去世后，在他复职的斗争中，他几乎得到了各方面的支持，但这种支持是因为他在党内的影响、他的能力和他的主张所形成的。”

第四，是邓小平“在取得对华斗争胜利后，牢牢地把握住了领导集团。自那以来的新政治环境，使得邓第一次能对所有重要决策

作最后的仲裁。和毛一样，他是所有事情的决策者，但他身上没有个人崇拜。实际上，他更愿意依照手下人不同的组织能力，将决策权交给他们，从而为自己留出大部分时间来考虑战略、人事、改革目标和机构调整等问题。总之，他处在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的顶峰。”

戴维·W·张认为，邓小平的独特高超的领导风格，既来自他的求实进取的精神，也与他比较深入地了解西方国家现代发展水平有关。他说：“他是20年代以来唯一到国外广泛旅行过的中央领导人。他有在民主—自由法国的几年生活经历，1949年以后，他经常到国外去旅行；尤其是在产生灾难性后果的‘文化大革命’期间（主要是后期），1974年，他去了欧洲和美国，在联合国特别会议上发言，1978年中美两国外交大门正式打开后，作为中国的‘铁腕人物’，邓立即作为美国政府的国宾访美。这样，邓象周恩来一样，比其他入更早了解有关别国现代发展和生活水平情况。这些独特的经历也许对他的改革政策和把重点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方面起了作用。”

继毛泽东、周恩来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国最有权威和影响力的政治领袖。海外许多学者将三人进行比较研究，典型的看法是，“毛泽东是一个富于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有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底的对抗主义者。”有的学者分析说：“毛泽东是个浪漫主义者，一个沉迷于诗行的空想家；相反，邓小平是位现实主义者，一位精明的生意人和一位善于使可能变成现实的实践家。”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毛、邓政策的差异，指出：“毛泽东强调意识形态重新塑造的必要性，而邓小平则号召进行经济和技术改革；毛泽东信奉阶级斗争，而邓小平却大谈各阶级的团结；毛泽东要求经济上自力更生，而邓小平要使中国向来自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贸易、投资以及合资企业开放；毛泽东教导说，增加以及由此达到的进步可以通过意识形态因素做到，而邓小平却使用物质刺激使人